

历史回顾

瑞典东亚福音会是一个普世教会的非盈利组织，于 1982 年由瑞华会（1887 年成立）和瑞蒙会（1897 年成立）合并而成。

瑞华会传教士姓名及照片列表 [（链接）](#)

瑞华会

1887 年 1 月 6 日，符愷励离开瑞典的哥德堡去往英格兰。在那里，他开始逐步计划到中国去作一名传教士。虽然在他离开瑞典的时候，既没有任何经济支持他在中国的工作，又没有确定的工作领域，但是他当时就已经开始计划中国之行了。

符愷励的中国之行可以说非常特殊。当他到英国去学习语言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位英国女士。这位女士曾经听到上帝的召唤，要她用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去资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中国当传教士。当她看见符愷励的时候，她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小伙子就是她要资助的人。

1887 年五月，为了支持符愷励在中国的工作，瑞华会成立了。该团的首位秘书长是约瑟夫·汉姆格牧师 (Josef Holmgren)，他历任 20 多年直至 1911 辞世。此后，该职位由欧·文·菲利兹 (O. von Feilitzen) 上校担任。



符愷励, 瑞华会创立人。

从英格兰出发六周后，符愷励到达上海。虽然他在中国没有任何朋友，但是他结识了一位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创始人戴德生 (Hudson Taylor)) 的传教士。在这位新相识的帮助下，符愷励在上海安顿下来并开始学习汉语。中国内地会也帮助他选择了传教地域：主要集中于黄河沿岸，以平阳为中心的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交界地区。

符愷励以及后续传教士与中国内地会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他们借此取得了与中国内地会在伦敦建立的传教学院的联系，并在上海获得了学习汉语的帮助。他们还采用了很多中国内地会的做法，比如穿着中国服装，男传教士们甚至模仿清朝男人梳辫子的传统。虽然瑞华会与中国内地会有了紧密的合作，但是符愷励一直竭力保持瑞华会的独立性。



符愷励身着中国传统服装。

1888年五月，瑞华会第一次召开年会，并决定派遣汉瑞克·钱德 (Henrik Tjäder)和安娜·格拉 (Anna Grahn) 到中国工作。安娜·格拉早在哥德堡时就与符愷励在相识。当他们身处异国远隔万里的时候，两人一直鸿雁传书，后来符愷励向安娜·格拉求婚。1888年底，钱德和格拉达到上海并开始学习汉语。

1888年十一月，符愷励迁至运城。他开设了一家诊所并帮助当地鸦片成瘾的居民脱离毒瘾。当时，吸食鸦片的民风使很多中国人成瘾，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当时很多中国人对外国人有怀疑和偏见，不能接受这些从国外来的传教士。但是看到了他们不断努力帮助人们解除毒瘾，传教士们因此逐渐获得了当地居民的信任。1889年二月，瑞华会的第一个基督徒在运城接受洗礼，同年九月，符愷励与安娜·格拉在上海结婚。



瑞华会黄河沿岸主要工作领域图 (放大图片)

自 1889 年开始，瑞华会帮助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工作。在该会成立的 5 年之间，有 16 位传教士，其中有八名女性，八名男性，从瑞典来到中国。



1896 年多区会议

传教士们大多从事医疗和教育工作。他们工作的地区大多饱受自然灾害和饥荒的侵袭。因此，为灾民提供药品和食物等援助成了传教士们的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传教工作站也经常是需要帮助者的聚集地。慢慢地，在中国人之间，对传教士的信任程度也越来越高了。

1890 年，瑞华会首各女子社团在瑞典成立。这些妇女聚集在家里制作手工制品，例如缝制桌布和衣服，并在教会组织的集市上将其出售以支持瑞华会在中国的工作。

符愷励看到了传教士的医疗工作在中国的重要性。他看到了这些工作是如何帮助中国人撇下偏见、建立对传教工作的信任。在 1893 年的一篇文章里，他鼓励瑞华会传教士们应该投入到更多的社会工作中去。



运城女子学校。（左一）传教士奥古斯塔·巴尔各女士



运城男子学校

1896年，瑞华会自主创建的杂志—《希尼之国》开始出版。文章介绍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工作，读者也应要求在祈祷的时候为这些传教士祷告。

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图片 1](#)，[图片 2](#)，[图片 3](#)，[图片 4](#)，[图片 5](#)。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爆发。这次运动主要针对外籍人士和与外籍人士有交往的中国人。当时，大约有3000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工作，其中有250人，包括50位瑞典传教士不幸遇害。瑞华会的传教士由于受到政府官员的提醒，全部人员及时逃离暴乱，无一人伤亡。有的官员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这些传教士。

经历了一年的暴乱和饥荒，1901年，传教士们又回到了他们工作过的地方。自1902年至1910年间，还有29位新的瑞华会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

在瑞华会传教活动的最初 15 年里，没有任何传教士或家属去世，但是随后的几年里，情况就变得艰难了。

1911，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并成立了中华民国。随后的几年里，中国进入了地方政治纷争和军阀混战时期。由于社会的不安定性，传教士们被迫暂时离开工作领域。很多其他教会的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孩子在这期间遭到抢劫甚至杀害。尽管如此，传教士们还是毅然留下并继续他们的工作。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新的传教士不断前往中国。

1918 年，一所教育传教士后代的学校在湖南成立，由符愷励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咪咪负责照顾教育儿童。另外有五个教会加入该校，并把他们的孩子也送来学习。在此之前，传教士的孩子们都是送回瑞典进行教育的，由朋友或亲戚照顾。因此，孩子再次与父母见面大约相隔 7-10 年之久。有了这所新的学校，孩子们可以在中国上学，而且至少每年都可以在暑假时同父母见面一次。如果相隔不是很远的话，他们也可以在圣诞节时再见到父母。

自 1919 年至 1930 年，瑞华会共派遣了 23 名新的传教士。

在符愷励的强调下，瑞华会的主要工作原则之一就是建立独立的中国本土教会。帮助建立教会却并不实行管制，这一点非常重要。1918 年，第一位中国牧师开始工作，中国的教徒们也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拥有更多的独立性。

1926 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爆发。当时的战争对外籍人士充满敌意，这种憎恨也转嫁到外国传教士身上。很多传教士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地域到沿海的大城市寻找安全。1927 年在湖南为传教士的孩子成立的学校也由于战乱而被迫关闭。

当国家军队平息军阀混战之后，传教士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领域。在 1932 年至 1939 年期间，又有 20 位新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三十年代时，饥荒和传染病席卷中国，加上当时有很多人逃离战乱。传教站变成了接纳难民的庇护所，传教士也主要从事赈济救助工作。有些传教士因感染伤寒而不幸去世。传教站在大多时候都是安全的，只是有几次，一些传教士受到了攻击。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大约五千万至六千万的中国人逃离日本侵略者。瑞华会在黄河沿岸的工作领域也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自由地区，另一个是日军占领区。在日军占领区，传教士的主要工作是救助难民。虽然这是在日军不断的控制下进行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传教士们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对待。自从美国加入二战之后，传教士的处境却变得艰难了很多。

在日军占领区，所有基督会众都被迫编入一个组织—北方联合基督教会。而且，他们不得接受任何来自外国传教会的经济资助，因此，北方联合基督教会也变得更具有独立性。

1945 年，情况变得更加严峻，传教工作难以继续。大多数传教士，包括瑞华会的传教士，离开了中国返回家乡。有一些传教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并于年底返回了工作领域。此后的三年内，很多回到瑞典的传教士也重返中国工作领域，继续传教救助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华会于 1946 年在运城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记录了在过去几年里工作中的重大变化。“我们的工作领域里的中国教会，在经济方面上已经独立了。”“我们有一群本地牧师和其他领导者，我们尊重他们并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精神上的帮助。我们传教士可以帮助他们的工作了。”

1948年，不稳的政局导致中国内战爆发。传教士们再一次被迫离开工作领域。运城传教站的艾纳·列妮和姚长老成为瑞华会的第一批殉道者。他们被控是帝国主义者并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1946 运城工作领域会议

一些在 1948 年没有返回瑞典的传教士来到宜平并在内地会的传教站工作。1949 年秋，政局迫使他们必须离开中国，于是他们去了香港。两位在湖南工作的传教士，埃维德·赫特博格 (Arvid Hjartberg) 与玛丽雅·皮特森 (Maria Petterson) 由于无法在共产党接管该地区之前离开，直到 1951 年才离开中国，因此他们成为了瑞华会最后离开中国的传教士。

之后，很多瑞华会的传教士都开始寻找新的工作领域。其中一些人去了日本并开始在那里工作。因此，不久之后，瑞华会改名为瑞华日会。